

● 中国近现代史

简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社会 发展进程的若干影响

陈 国 清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国清(1951-), 男, 湖北浠水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民主革命时期中外关系研究。

[摘 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政局动荡, 战乱连绵,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均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民族资本主义的勃兴使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 并且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 十月革命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新文化运动发生了质变。故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 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 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也为中国革命转变提供了政治时机, 奠定了阶级基础和准备了思想条件。

[关键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社会; 若干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1-0019-07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各种政治、经济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这场帝国主义之间的厮杀既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又教育了人民, 削弱了帝国主义; 在战争中诞生的苏维埃俄国及战后出现的世界革命形势表明, 作为历史进程的战争加速了社会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帝国主义间的举手投足势必牵动其身。大战使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 同时又使日、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因此, 大战既给中国社会造成了灾难, 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潮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中国社会转型不可忽视这一历史事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政治上的新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1](第 143 页)。战前各帝国主义共同侵华的均势与日本意欲“谋取在华优势地位”之间的矛盾, 使素有独霸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极为不满。当 1914 年 8 月大战爆发后, 日本朝野好战分子, 都认为大战“对日本国运之发展, 乃大正新时代之天佑”, 是“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 “怀柔统一中国之人物”(指袁世凯), 变中国为日本附属国的绝好时机^[2](第 136 页)。此期尚未赴华的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叫嚷: “怕他战不成, 战则大妙。”鼓吹侵略著称的黑龙会等组织, 把欧美势力因大战无暇顾及远东看做是“千载难逢的时机”。1914 年 10 月 29 日, 黑龙会会长内田良平秘密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 该意见书建议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缔结一举变中国为日本附属国的《国防协约》。1914 年 12 月, 日本政府正式确立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并于 1915 年 1 月正式要求袁世凯政权予以承认。1915 年 5 月, 袁世凯政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下签订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这是日本朝野侵华势力利用大战毫无顾忌地实施独占中国的

第一件“作品”。大战期间及其以后的几年里,日本对华所实施的野蛮侵略,都是以“二十一条”为出发点,都是“二十一条”的贯彻和延伸。

英、法、俄、意等帝国主义尽管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但由于本身已陷入欧战,为了保存自己侵华的既得利益,竞相与日本妥协和勾结。大战初期,英、法、俄一度曾想拉拢袁世凯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但日本政府马上出面干涉,提出“以后凡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必须先与日本磋商”^[3](第288页)。英、法、俄立即将此议作罢。1916年7月,沙俄率先勾结日本签订《俄日协约》和俄日第四次《秘密协约》;1917年春,英、法、俄、意等国纷纷与日本订立密约,迎合讨好日本,出卖中国。在大战期间,惟有美国是日本独霸中国的一大心患。美国有心与日本在争夺中国的问题上一决雌雄,但是,它此时既要关注欧洲大战,大发军火财(后又投身战火),显然力不从心。因此,在与日本的抗衡中,政治上有争夺也有勾结,经济上则乘虚而入,渗透扩张。1917年11月在华盛顿与日本签订的《兰辛石井协定》则是美国政治上妥协日本,经济上抗衡和威胁日本的文证。

大战期间帝国主义侵华格局的变动,表明以往他们依靠的纵横捭阖和秘密协定所保持的侵华均势已被打破,日本已成为亚洲惟一强大的力量,可以不受或少受牵制地放手侵华。

由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变化,中国的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复辟丑剧不断上演。1915年底和1917年夏,袁世凯、张勋先后上演了两幕复辟帝制的丑剧。(2)北洋集团公开分化改组。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的矛盾逐渐公开化、白热化,最后裂变为直、皖、奉三系,他们初始是暗斗明争,后来则是兵戎相见。(3)皖系军阀气势夺人,“武力统一”甚嚣尘上。1916年以后段祺瑞总政,“一手遮天,目无余子”,一意孤行地诉求武力统一中国于皖系军阀。(4)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屡起屡扑,陷入绝境。尽管他们积极地同袁世凯、段祺瑞的独裁卖国行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可是,不仅革命无所建树,而且连反袁反段的主帅地位也不能保住,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逃脱不了失败。

中国政治变化的成因,固然有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的原因,但与帝国主义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前述政治变化的(2)、(3)两点,与帝国主义的战时分裂剥削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侵华的均势逐渐为日本所打破,尤其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失去了侵略中国的共同走狗,此时又没有一个人“强人”继起。显然在中国倡导“武力统一”,那只能大权归于亲日的皖系军阀。这种局面是日本所希望的,其它帝国主义是不愿意接受的。故此,帝国主义为了各自在华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各寻走狗,利用培植的走狗看管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达到自己所想要达到而一时又不能达到的目的,这是势在必然之事。并且北洋军阀各派在总头子袁世凯死后,也需要各找靠山,况且军阀们都有卖国媚外的特征,这在客观上又保证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政策的实现。在促成北洋军阀分化改组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行动最早、走得最远。当英、美、法、德一致维护袁世凯这个“强人”、支持其称帝时,日本就反其道而行之,奉行捣乱去袁政策。袁世凯死后,日本则从财力上、武器装备上援助段祺瑞。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在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期间,日本供给皖系5亿日元的贷款,帮助段祺瑞训练和装备3个师、4个混成旅的“参战军”。段祺瑞的心腹大将徐树铮曾供认皖系军阀的祸国罪行完全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他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日本人“认为东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为政局之中心”,日本“扶持我派宗旨、始终不变”^[4](第240页)。可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的变种。段祺瑞政权独裁内战这一特征折射了大战期间列强在华力量对比的变化。

大战期间中国政治变化的(1)(4)两点,尽管其成因主要是中国内部的自身原因,但是,从客观上讲,不能说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袁世凯、张勋敢于复辟,是因为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美国政府利用报纸,特别是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反映他们的对华政策,鼓吹中国政府应该是一个披着立宪外衣的君主政府。英国政府则是通过它的驻北京公使朱尔典表达了希望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意愿。日本政府则是利用袁世凯的帝王欲,以签订“二十一条”相交换。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隐含深意地向袁世凯表示:“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5](第135页)袁世凯的爪牙后来回忆说:“当时外国使节没有一个对袁称帝表示不赞成”^[6](第162页)至于张勋复辟的发生,首先则是因为日、美为争夺

控制中国参战权而引起黎(元洪)、段(祺瑞)交恶,从而使张勋得机进京“调停”;其次,复辟前,德国源源不断地接济军火,“愿以德华银行资本”协助张勋“假以举大事”的表示使张勋自恃有力量^[7](第52页)。再次,1917年5月,日本政府的参谋次长田中到徐州煽动张勋出来收拾混乱局面,使张勋产生了错觉,以为日本方面也是他复辟的支持者。故此,袁、张的复辟既是他们的封建思想作祟,又是帝国主义推波助澜的结果。又如资产阶级革命的屡屡失败,诚然自身的缺点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但并不是惟一的原因。就客观原因而论,反革命力量大于革命力量,“这种反革命力量,就是军阀。为什么军阀有这么大力量呢?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8](第399页)。这是孙中山先生后来才认识到的,但是在大战期间,他并未察觉到,仍然尊帝国主义为师,而帝国主义呢?或冷淡他或有意与他过不去。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中国全国,大乱立见”,“起而干涉并整理之”,“默认”黑龙会等“民间人士”(好战分子)支援中国人(南方反袁的革命派和伺机复辟清朝的宗社党)反袁活动的方针^[9](第407页)。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仅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捣乱”中国的一支枪。而且此时军阀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勾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军阀有帝国主义的撑腰和援助,自然也就更有力量来挫败革命力量。

帝国主义在大战期间奉行的分裂剥削中国的政策,不仅使中国政治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而且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国政治混乱和黑暗到极点,战争连年不断。在大战期间和其后的几年里爆发的大小战争数以百计,那时的中国几乎是每天都有战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不仅导致中国内战不息,而且使中国的政治舞台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频频易人局面,从1914年至1924年,中国的政治体制,一会儿是总统变皇帝,一会儿是废帝改总统。十年中平均每年要更换一次“一号人物”,每年有三位内阁总理下台上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这说明大战期间的帝国主义政策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把中国的统治者和反动军阀引向了迅起迅灭的死亡之路。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民族工业的勃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政治上使中国呈现出乱状,然而,在经济上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发展时机。此期间中国经济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民族工业在短期内有了迅猛的发展。仅以工业投资来说,1913年为49,875,000元,1917年为128,244,000元,1920年为155,221,000元,增长了3倍左右^[10](第249页)。这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此期民族工业在纺织、面粉、卷烟业等方面的进步最为显著。

1、纺织业

在大战期间,“执全世界棉纺业霸主之英国,已奋身跃入大战之漩涡”,产量日减,中国一向进口英国棉货,此时骤感缺乏。1915年每生产一包十六支纱还要亏损白银3.13两,1916年也不过盈利5.45两,而1917年至1920年,每包十六支纱最少可得利15.33两,最多可达50.55两。国内很快就掀起了一个纱厂建设热潮,这个热潮持续到1922年。全国民族资本的纺织工厂迅速增加,至1922年已有64家,较战前的11家增加了将近五倍,纱厂开工锭数从1913年的484192锭上升到1922年的1506634锭。布机在1915年仅有2254架,到1922年猛增至9817架。有人曾把这种情况称作“纱厂建设狂潮”^[11](第402页)。

2、面粉业

与纺织业并驾齐驱的是面粉业。战前外国洋粉充斥国内市场。但大战爆发后,形势骤变,民族资本主义的面粉工业不仅可以独占国内市场,而且中国从面粉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1913—1921年的9年间,全国有123家面粉厂设立(平均每年设立13.7家),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有105家,占全部新设厂的85.4%,其生产能力占全部新设厂生产能力的82.5%^[11](第403页)。全国销往外国的面粉数量,1914年还不足7万担,1915年接近20万担,以后逐步上升,至1918年已超出200万担,1920年更接近400万担^[12](第40页)。我国面粉出口由入超一变而为出超。

3、卷烟业

大战前全国有新式烟厂 10 余家,大战期间及其后,仅上海一地,1915 至 1922 年即开设 56 家之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906 年,最初资本不过 10 万元,大战期间资本总额由 100 万元(1915 年冬)增至 500 万元(1918 年),最后增加到 1500 万元(1919 年)。每年盈余 400 多万元(1920—1921 年)。南洋烟草公司的如此发展,曾使战前几乎独占中国卷烟市场的英美烟业公司的销路一度受挫。

此外,大战期间机器修理业及制造、火柴、造纸、玻璃、针织、肥皂、食品加工等行业也均有发展。

尽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其严重的弱点,并且在 1922 年九国华盛顿会议后,随着帝国主义卷土重来,这种“黄金时期”宣告结束,民族资本主义再次陷入艰难的困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勃兴的民族工业,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它是一种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作用。

第一、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据计算,一个熟练的手纺工人,平均每人每天以 11 小时工作为限,可出纱(假定为十六支)四两,而在当时的民族资本主义纱织工厂中,平均每个工人每 11 小时工作日可出纱 20 斤,机纺工人的生产能力相当于手纺工人的八十倍^[13](第 267 页)。在面粉工业中,福新八厂 215 名工人每日夜可出粉 16,500 包^[12](第 80 页),平均每人每日夜出粉 76 包,这种生产力当然是人力推动的碾、磨所望尘莫及的。与此同时,民族资本主义还培养了大批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作出了贡献。

第二、造成了生产的集中代替了生产的分散。从地区上看,民族资本主义厂家多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无锡等城市;从行业来看,它们集中在面粉、纺织、火柴、运输、水泥及机器制造与修理业;从人数上看,战前很少有千人以上的民族工业,而大战后,仅以申新的六个纱厂为例,少的 2000 人以上,多的达到 5000 人。当时永安厂、恒丰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启新洋灰公司的工人数都在千人以上。当然这样大的厂子并不多,但是不能不承认,在轻、重工业的一些部门都出现了战前未曾有过的集中。中国几千年来都只有分散的小生产,而这几年里却出现了如此规模的生产集中,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加强工人阶级团结、发动革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从而使中国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截止 1920 年,全国劳动者约有 500 余万人(农业劳动者除外),而近代产业工人约有 200 万人。与 1912 年北京政府统计的最高记录 66 万人比较,增加了将近两倍。新增长的这些工人相当多数分布在民族企业中。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特点和优点使中国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战前中国工人阶级在各阶级中的比重所占极小,并且在政治生活中一直是追随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是一个自在的阶级,1919 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则一跃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第一次开始实践无产阶级的政治使命,开始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为全国各界所瞩目。

此外,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提出自己的政治、文化诉求,这就解释了大战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与高涨的部分原因。

民族资本主义的上述作用表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它是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它对于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打破帝国主义垄断中国市场,加强各地区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联系,促进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由于工界、商界、学界民主进步力量的增强,尤其是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显著变化,这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经济本身的意义。

三、巴黎和会与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蓝图和具体方案还未正式出笼时,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寄托着很大希望的,普遍对西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除了北京政府官方举行了大庆外,民间也举行了庆祝。由于受到大战结束的鼓舞和美国总统威尔逊欺骗宣传,那时跟在协约国帝国主义后面大喊“公理战胜强权”的人数相当广大,“公理战胜,强权失败”一时简直成了当时人们的一句口头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全篇主旨就是“公理战胜了强权”这个意思,把威尔逊称作“现在世界上的第一好人”。《每周评论》为将来的世界和中国描绘了一幅战争和侵略永远绝迹的美丽图景:“这次协约大胜,大家都知道是公理战胜强权,将来的世界上,弱国小国可以出头了,已亡的波兰可以恢复了,巴尔干小民族可以自主了,况且美国要组织一个世界大联盟,不准强大的国欺侮弱小的国,中国以后若不象义和拳那样胡闹,便没有什么外患了。”^[14](第3号)又说:“大同盟(指国际联盟)果然成立,那秘密条约,不正当的借款,过分的军备,强国的跋扈,都不能够存在的。列强果能赞成这个大联盟,从此以后,人道有了光明,民治可以普遍了。”^[15](第5号)由于陈独秀和《每周评论》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处的地位的缘故,这就加重了许多人原有的幻想。那时在一般人的眼中,除了日本这个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被列为“强权”外,老奸巨猾的英、法帝国主义和一向以隐蔽方式侵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都成了“公理”的化身。许多群众团体还曾经企图联合起来,向巴黎和会表示人民的愿望,给和会以影响,使其帮助实现中国独立的要求。如留日学生救国团曾提议组织赴欧诉讼团,国民对日外交后援会议决派代表赴法,上海工商界的许多团体曾组织中华工商保卫国际和平研究会,并联合全国商会联合会及各省商会,共同向巴黎和会提出要求。

在那举国欢庆协约国战胜的时刻,只有李大钊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他在演讲中指出:“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治,是全世界的庶民。”这次大战的结束是“民主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失败”,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政治命运“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阀主义同归消亡”^[16](第593页)。可是,李大钊的这一瓢冷水并未使欢庆“公理战胜强权”的人们惊醒,巴黎和会的实际进程产生的严酷事实却无情地粉碎了人们的幻想。

1919年1月,北京政权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最初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第一项是希望在中国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第二项是请求和会取消1915年5月25日的中日协约(即21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但是两项请求提案都遭到和会最高会议的拒绝。此时中国的惟一希望是山东问题能够顺利解决。但是,操纵和会的英、法、美三巨头4月30日最后议定的巴黎和约第156、157、158款,却规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

当巴黎和会失败的噩耗传来时,人们痛苦、愤怒到极点,一场规模空前的五四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从此中国人开始从幻梦中回到现实。几个月的分赃活动,使陈独秀得出“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结论(指南北军阀在上海召开的和会和巴黎和会)。5月4日,陈独秀为《每周评论》写下了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评论,他说:“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17](第20号)这样威尔逊由“世界上第一好人”变成“一文不值”了。这说明中国知识界随着帝国主义面目的一步步暴露,对其认识逐步加深了。

李大钊在和会外交失败不久的5月8日所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日本所以还能拿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些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16](第214页)李大钊根据对于帝国主义强盗世界的新认识,进一步提出了“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改造强盗世界”的彻底反帝口号。这就使得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飞跃,给“五四运动”赋予了彻底反帝的革命性质。

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的逐步扩大,特别是巴黎和会事实的教训,人们已经看到了从前追求的新文化并不是救中国的思想武器。《新青年》及其它宣传新文化的刊物,不再像以前那样热烈鼓吹“法兰西文明”,新文化运动较前期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第一、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醒悟到“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新青年》社“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8](第 427 页)。第二、由轻视群众变为尊重群众。“五四运动”前,大多数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把人民看做是无知、落后的一群,并且自居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先知先觉者”。在“五四运动”中,这种轻视群众的思想则有很大的改变。陈独秀为《每周评论》写的文章中,点名道姓地说威尔逊的话“一文不值”,在《劳动者的觉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19](第 300 页)有的知识分子甚至提出“斧凿的文明比笔墨的文明,更是可贵”^[20](第 2 页)。这些情况表明,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由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第三、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宣传内容。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以后,接连不断地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到 1920 年 9 月《新青年》改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更是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说明从 1919 年 5 月到 1920 年 9 月,《新青年》逐步向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刊物演变,到 1920 年以后则成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刊物。《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那么《新青年》的转变也应看作新文化运动的转变。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以后认识上的这些变化,应该说既有十月革命影响的作用,也有帝国主义从反面教育的作用。帝国主义的反面教育主要表现在巴黎和会这一严酷事实的教训。从 1840 年至 1919 年,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外力的作用始终相伴随。“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认识上的飞跃,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与外力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即与巴黎和会的棒击是绝然不可分开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重大的,并且这种影响不是局限在某一方面,而是全方位的、多向的。大战给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的影响,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政治时机,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论及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转变时,仅仅强调十月革命的作用,很少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对中国总体上的影响,这是欠全面、客观、公允的,显然不利于揭示一切革命发生、发展的深刻原因。应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战期间爆发的十月革命,这两者都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国际事件。十月革命对中国近代历史转变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它的正面教育和在方向上的启发、引导作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主要是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和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转变准备了条件。只有这样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和作用,我们才能理解“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这个论断的含意^[21](第 667 页),进而得出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都是改变中国历史方向,划分中国历史时代的重要国际条件。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日]井上清. 日本军国主义:第 3 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3] 陶菊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M]. 北京:三联书店,1983.
- [4] 来新夏. 北洋军阀史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5] 胡绳.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6] 吴长翼. 八十三天皇帝焚[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 [7] 彭明. 五四运动中[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8]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 下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9] [日] 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 上册[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10]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中国近代经济史: 上册[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1] 王方中. 中国近代经济史稿[M]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2.
- [12]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荣家企业史料: 上册[Z]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 [13] 严中平. 中国棉纺史稿[M]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3.
- [14] 每周评论: 第 3 号[J] . 1918-12-03.
- [15] 每周评论: 第 5 号[J] . 1919-01-19.
- [16]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17] 每周评论: 第 20 号[J] . 1919-05-04.
- [18] 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C] . 北京: 三联书店, 1984.
- [19] 陈独秀. 独秀文存[M]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 [20] 南洋: 第 1 卷[J]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1919-07-15.
- [2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桂 莉)

My Humble Opinion on Some Influences of WWI on Chinese Society

CHEN Guo-qing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 Guo-qing (1951-), male, professor,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and foreign relationship in Democratic Revolution.

Abstract: During WWI, China's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unstable, the flames of war raged everywhere, both the ruling classes and the ruled couldn't live through as they used to. The vigorous growth of National Capitalism expanded the number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its going up on the political stage in May 4th Movement.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propagation of Marxism led to the qualitative shange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us, WWI and the fa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not only change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global history, divided the era of the history, but also provide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transform from paleo-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neo-demacracic revolution, laid the class foundation and prepaired ideological requirement.

Key words: WWI; Chinese society; some influences